

现 代 中 国

第六辑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现代中国 ⑥第 远辑 轱平原主编 ⑥-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⑥⑥⑥⑥⑥⑥
陈平 陈平 陈平 陈平 陈平 陈平

I ⑥现... II ⑥陈... III ⑥社会科学文集 IV ⑥陈

中国版本图书馆 悦受数据核字(⑥⑥⑥⑥第 ⑥⑥⑥⑥号

书 名 :现代中国·第六辑
著作责任者 :陈平原 主编
责 任 编 辑 :张雅秋
标 准 书 号 :陈平 陈平 陈平 陈平 陈平 陈平
出 版 发 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⑥⑥⑥⑥ ⑥⑥⑥⑥
网 址 :陈平 陈平 陈平 陈平 陈平 陈平 电子信箱 :陈平 陈平 陈平 陈平 陈平 陈平
电 话 :邮购部 ⑥⑥⑥⑥ 发行部 ⑥⑥⑥⑥ 编辑部 ⑥⑥⑥⑥
排 版 者 :北京军峰公司
印 刷 者 :北京大学印刷厂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陈平 陈平 陈平 陈平 陈平 陈平 陈平 陈平 陈平 陈平 陈平 陈平 陈平 陈平 陈平 陈平
⑥⑥⑥⑥年 ⑥⑥月第 ⑥⑥版 ⑥⑥⑥⑥年 ⑥⑥月第 ⑥⑥次印刷
定 价 :陈平 陈平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 ,翻版必究



第六辑

目 录

论 文

- 燕园的三个学生刊物..... 钱理群(员)
- “杂志”里的 源年代
- 《文艺春秋》和《文艺复兴》研究 程光炜(国)
- “沙龙”、“大会”与“单位”
- “新文学运动方式的转变”之一 钱文亮(缘)
- 战乱年代的另类书写
- 试论废名的《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 吴晓东(苑)
- 赵树理文学的现代性问题 贺桂梅(怨)
- 论延安的新秧歌 赵锦丽(员)
- 歌剧《白毛女》在延安的诞生 刘震、孟远(员)
- 游园惊梦,古典爱情
- 现代中国文学的两度“还魂”..... 王德威(员)
- 香港与 源—缘年代的文化转折 陈顺馨(员)
- 韩国的解放空间(员—员)与文学 〔韩〕白元淡(员)
- 缘年代的通俗文艺
- 以赵树理《三里湾》的出版为中心 〔日〕樱尾季美(圆)

对 话

答客问

- 关于历史分期、“两个口号”等 王 瑶(圆毅)
 “中国三十年代文学研究会”与日中文化交流 〔日〕丸山昇等(圆毅)
 文学复古与文学革命

- 木山英雄著作出版座谈会 〔日〕木山英雄等(圆毅)
 在东京独逸语专修学校就读时的鲁迅 〔日〕北冈正子(圆毅)
 大师的意义以及弟子的位置

- 解读作为神话的“清华国学院” 陈平原(圆毅)

- 《现代中国》第 员—缘辑总目 (猿毅)
 编 后 (猿毅)

现代中国·第六辑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8年 8月

燕园的三个学生刊物

钱理群

(一)《红楼》：“山雨欲来”前的青春歌唱

1957年的第一个早晨,北京大学大餐厅(今大礼堂的原址)前,两张大餐桌上堆满了刚刚出版的大型学生文艺刊物《红楼》的创刊号。参加了通宵狂欢的北大儿女们,晚妆未残,微有倦意,便围购如堵。只见一位衣着淡雅、步态轻盈的女大学生和几位男同学在那里忙碌着。这位女生就是后来以其壮烈之举震撼全国、并最终载入北大史册的林昭,当时她就已经在燕园文坛上颇有诗名,诗友们都亲昵地称她为“林姑娘”。但此时的读者却对她并不注意,他们已经被新出的刊物封面所吸引:这是一幅木刻图案,是一个牧羊人正驱赶着羊群走下山岗,山上草木摇曳,山外浓云翻滚,题名是:“山雨欲来。”^①——多年以后,人们才意识到这竟是一句“谶语”。^②

打开刊物,第二页便刊登着著名的 1950年代校园诗人、如今是北大中文系教授的林庚先生的《红楼》——

红楼你响过五四的钟声
你啊是新诗摇篮旁的心
为什么今天不放声歌唱
让青年越过越觉得年轻

这里响彻的正是这个新诞生的校园刊物给自己定下的旋律:尽情享受“年轻”的

① 参看张元勋:《北大往事与林昭之死》,收《没有情节的故事》,第 333—337页,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

② 谢冕:《开花和不开花的年代》,收《开花和不开花的年代》,第 1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青年”的“放声歌唱”，这是一种典型的时代与个人的“青春歌唱”。在《发刊词》里，对此有更具体的阐述——

我们的刊物是以红楼命名的百花园。我们的百花园必将五彩缤纷，万紫千红。红楼的光芒照在花园里，这红光告诉我们，要学习五四时代青年的革命精神，要大胆地干预生活，要勇于和善于建设，支持属于我们时代的，使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的一切，也勇于和善于揭发、批评阻挠我们前进的陈腐的一切！我们的红楼要有青年人的特点：不仅主要是青年人写，还要着重写青年；不仅主要是学生写，还要求写学生。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指导下，它将发表不同风格的创作。我们的花园欢迎从任何地方寄来的花种，只要它是真的花，有生命，在我们这里，都有它生长的土地。

可以看出，这样的青春歌唱的激情是被时代所唤起的：几乎所有的年轻大学生都毫不怀疑地相信，无数先驱者为之流血奋斗的、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真正的民主、自由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新时代已经向他们走来，他们的任务就是发扬五四的革命、批判与创造的精神来迎接这个时代，以时代和国家主人翁的姿态，发出年轻人自己的声音。

这可以说是当时北大的“校园心境”。或许读着这期《红楼》，燕园学子就会回味起刚刚度过的新年联欢晚会的情景——这几乎成了晚会参加者终生难忘的校园生活中最后一个美好的记忆：“大餐厅的中心放着一个直径两米的大花盆，里面载着一株五六米高的针松圣诞树，树叶之间灯光明灭……‘迎接伟大的一九五七年’金色大字悬挂在主席台上，所有的聚光灯都投射在这十个金色大字上，仿佛它就是即将展现在我们面前的那金色的日子！……午夜十一时三十分，我们敬爱的马寅初校长、周培源教务长等学校领导来到迎接新年的会堂，登台贺年，舞曲骤停，八千骄子静立。当午夜的钟声敲响第十二响，余音未绝，北大沸腾了，如群山在笑！……”“马老的习惯用语‘兄弟我！’刚一出口，他的话就被海涛般的掌声所淹没”，他出乎意外地朗声说道：“恭喜诸位新年发‘才’！”看到同学不解的眼光，又不慌不忙地解释道：“这不是‘财富’之‘财’，而是‘人才’之‘才’，祝福诸位成为国家建设的栋梁之才！”哗然大笑之后，又响起了经久不息的掌声……^①“成才”，确实是那个年代的北大学子共同的金色梦想，似乎也是时代的要求：就在1956年1月，在中共中央召开的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提出了“向科学进军”的口号；1956年，毛泽东又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正式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校园里的十七八岁、二十来岁的年轻人立刻被这“时代鲜丽而充满朝气的口号迷住了”，如时为北

^① 张元勋：《北大往事与林昭之死》，收《没有情节的故事》，第120—121页，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关于“发‘才’”这一段话，则是在会场中的本文作者的回忆。

大中文系二年级学生、《红楼》的编委谢冕所说：“就这样，我们这些如花的生命便集结在‘向科学进军’的旗帜下，从此开始了我们的 ~~1951~~世纪 ~~50~~年代的理想主义的‘进军’”。^①

在这样的时代风气下，校园里的文学气氛十分浓郁。谢冕的同班同学，也是《红楼》作者、校园诗人的孙玉石有这样的回忆：“我们这些不谙世事的年轻人，整天沉醉在喜欢的书本里，新鲜的文学作品中。为了满足同学们的创作欲，邓美萱、李鑫办起了手抄本墙上小报《小火星》，许多今天看起来也是最先锋的文学作品，都在那里发表。为了享受一场人艺名流演员演出的话剧《雷雨》，全班人散场后无车可坐，竟旷野放歌，夜走京城，到学校已经是凌晨四点了。我们宿舍的六个同学，个性和趣味各异，天南海北，无所不谈，后来索性弄一张纸，用毛笔写了‘六味书屋’几个字，贴在宿舍门口。张时鲁用他的内蒙口音，给我们这些从中学来的，经常大讲萧洛霍夫、杰克·伦敦、海明威，他赞不绝口的是：‘真了不起啊，《静静的顿河》、《荒野的呼唤》、《老人与海》！……’他像一匹饥饿的狼，吞噬着一些西方现代名著，总是埋头写自己的长篇小说。才华横溢的孙绍振，读的书最多，思想也像跑野马一样自由无羁，他和才女温小钰一起，常常把最先锋的作品的信息传到班上来。‘萧洛霍夫的《一个人的遭遇》，岳野的话剧《同甘共苦》，真是妙极了！’于是，我们班里很多人抢着看这些作品，为萧洛霍夫对于战争摧残人道的描写所震撼，为一些老干部进城以后的喜新厌旧而愤愤不平。拉甫列涅夫的《第四十一》，从小说到电影，班上看了的人交口称赞，简直佩服得五体投地。普希金、莱蒙托夫、聂鲁达、希克梅特，艾青的《宝石的红星》、《在智利的海峡上》，……几乎成为我们几个喜欢诗歌的人口头议论的专利。……在宿舍里，教室里，孙绍振常常伸出双臂，尖声高叫地朗诵着：‘伐木者，醒来吧！’……’——这“醒来”的呼喊，就成了那一代人生命中的永恒：孙玉石在 ~~1951~~年以后，回首往事时，“不能忘却的，而且要刻骨铭心要牢记于怀的”，依然是这呼喊。^②

于是，我们发现，~~1951~~——~~1951~~年的中国校园里的年轻人，正处在精神的苏醒之中，内心涌动着对知识、理性、理想的渴求，以及不可扼制的自由创造的冲动。年轻人的创作才情如熔浆般地喷发了。在《红楼》上经常可以读到这样的“北大文艺动态”：“中文系三年级同学王磊同学的诗集《寡妇泪》已在二月份由通俗文艺出版社出版”，“本校音乐创作组刘季林同学（中文系二年级）创作的音乐作品《少年钢琴

① 谢冕：《开花和不开花的年代》，收《开花和不开花的年代》，第 ~~150~~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0~~年版。

② 孙玉石：《“如歌”的岁月里》，《开花或不开花的年代》，第 ~~151~~—~~152~~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0~~年版。

曲》已被音乐出版社接受出版,这是作者的处女作”;^①各个外语系纷纷编辑出版学习翻译的刊物,计有俄语系《十月》、东语系《翻译习作》、西语系《桥》等,中文系的班级手抄刊物也如雨后春笋,如语言专业二年级一班的《短笛》、二班的《百花坛》、《小火星》、朝鲜族同学的《长白山》,新闻专业一年级三班的《向日葵》等等。^②校园文化活动也很活跃。据报道,苏联作家波列伏依、卡达耶夫,印度作家库玛尔,日本作家藤林成吉、青野季吉,奥斯特洛夫斯基(《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的作者)夫人,苏联电影大师邦达丘克,中国作家、学者李健吾、陆侃如、刘大杰、康濯、吴祖光,电影演员赵丹、白杨、黄宗英、孙道临等,都曾来校与学生见面、座谈。^③

《红楼》就是在这样的土壤中拔地而出。在此之前,已经有了《北大诗刊》(1951年创刊,初为狼獾开本,1952年改为员开本),聚集了几乎所有的燕园诗人,后来张元勋作了这样的描述:“当时的社长是现代派诗人赵曙光,社员则有古典派诗人崔道怡、哲理诗人马嘶、李任、海滨诗人孙克恒、叙事诗人薛雪、抒情诗人张玲、学者诗人谢冕、大漠诗人任彦芳、唯美诗人王克武等”,当然,也还有林昭和张元勋自己。当年,他和林昭一起负责编辑《北大诗刊——1952年新年专号》的情景,是永远难忘的。那一期的封面用的是粉红色的胶版纸,印着提着灯笼的女孩的刻纸图案,有一种朴素的美感,就是出自林昭的匠心。^④这一期还刊载了谢冕的一首《1952年骑着骏马飞奔而来》,其中有一句“虽然冰霜封冻着大地,可是我的心却燃烧得发烫”,与写在同时的张元勋的诗句“欣喜。冰已消融!春已有了消息!”都是传递着一种心声,以及对时代变迁的信息的某种直觉的把握与敏感。因此,由《北大诗刊》到《红楼》,是一个自然的延续和发展:从纯诗刊发展成综合性文艺刊物,除这些校园诗人之外,又吸引了更多的校园作者:写小说、散文、评论,以及画画、作曲的……都纳入其中,俨然形成了同学们所戏称的“北大文艺界”。据张元勋回忆,任《红楼》主编的是时为团委宣传部长的中文系助教乐黛云,副主编是康式昭、张钟(中文系四年级学生),编委有马嘶、李任、王克武、林昭、张元勋、谢冕、张炯(按年级自高而低排列)等。^⑤从编委会的组成,可以看出,《红楼》是一个在团委领导下的学生社团刊物。这就表明,1950年代的中国校园诗歌与文学,它既是五四所开创的校园诗歌与文学的继续,同时也具有自己时代的特点,和1950年代的中国文学一样,它的合法性与出版经费、空间都是由党、团组织和国家、政府(学校行政领导)所给予的,因

① 见《红楼》第1期《北大文艺动态一瞥》。

② 见《红楼》第1期《北大文艺动态一瞥》。

③ 见《红楼》第1期《北大文艺一瞥》。

④ 张元勋:《北大往事与林昭之死》,《没有情节的故事》,第181—182页,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

⑤ 同上,第182页。

此,服从党团组织的领导,是决定其存在与发展的绝对要求。在这一前提下,学生也有一定的自主性和活动空间,如以后我们所要分析的,这中间也会出现一定的缝隙和矛盾。《红楼》的作者,除前述《北大诗刊》的大部分作者外,还有沈泽宜、孙绍振、蔡根林、刘登翰、张志华、汪浙成、杨路、韩乐群、江枫、陆拂为、孙玉石、杨书案、洪子诚、翟奎曾……等。人们不难发现,这些作者尽管在反右运动以后有着不同的命运,但当1956年后中国开始出现新的复苏,他们就立即显示出新的活力,活跃在八九十年代的中国文学界与学术界,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红楼》是培育“不垮的一代”人才的摇篮。

《红楼》就是这样的意气风发、才华洋溢、充满创造活力的一代人的自我塑像。

《红楼》第1期“封四”的一幅照片配诗这样写道:“世界是这么广大,友谊是这么真诚,生活是这么美好啊,我们又这么年轻”(作者:任锋即林昭),于是,就有了这一代人的单纯而真诚的歌。他们在看来枯燥的大学日常生活中发现了诗:“在这短短的四十五分钟里,新铺的铁路又伸长多少公里?多少个灿烂的小生命,哇落在洁白的产盆里?多少倍‘四十五’的楼房,在祖国的大地上矗立起来?都在转瞬即逝的四十五分钟。也在这短短的四十五分钟,我们又跨出了坚实的一步,向着光芒四射的科学的高峰”(张志华:《大学抒情诗四十五分钟》,载《红楼》1956年第2期)。寂静的小小教室、图书馆联结着沸腾着的广大新世界,这是凝结着这一代人的大学想象的。他们更是低声吟唱心里流出的恋歌:“你是快乐的春天,我是沉默的冬天。你靠我如此的近,我又离我那么的远”(汪浙成:《恋歌》,载《红楼》1956年第1期);“我每次都看到你的背影,我们的距离并不太远!和风会吹融冻结的湖心,嫩绿沉默的田园。你——假如你是冬季,我是春天。”(白薇,即张元勋:《假如——答“恋歌”》,载《红楼》1956年第1期)。诗的意象、诗的语言,以及爱情本身,都是这样明净、清纯,这去尽粉饰的本真状态,或许也是这一代人心的追求。

也是刊载在《红楼》1956年第1期的蔡根林的《东阳江》,意蕴就不那样单纯,它或许是显示了这一代人生命深处更为丰厚的那一面。童年的回忆里,不仅有“无忧的童心”,更是处处流淌着“忧郁”:“我喜欢忧郁地在树丛穿行,错杂的灌木钩破裤腿,蹒跚过树丛,在江边,等待东边出现的白帆……我羡慕散搭在沙滩上的,像旷野里长着的蒲公英一样的帐篷,和那些成年在江上流浪的撑排人”;“东阳江,……你启发我去探索更宽阔的天地,我穿着你的水珠浸湿过的,你的沙砾灌满过的鞋,未长大就踏上流浪的途程……”。童年记忆里,更抹不去的,是这条母亲河长久沉默后的“凶猛的爆发”,以及这块土地上的人民的无尽的苦难:“乡人们把木犁插入泥中,咬住嘴唇顽强地生活,在筋疲力竭的夜,到浆腥味时才发出痛楚的叹息”。“东阳江,南方丘陵中的江啊,你教我像你一样地去爱人类,爱阳光和云霞,你教我像你一样去忍受和沉默,爆发和反抗,发出像你一样粗犷的吼

声”。这首诗里所显示的,与生养自己的土地和耕耘其上的父老乡亲的血肉联系,以及从父辈那里流传下来的“爱”与“反抗”、“沉默”与“爆发”,或许是这一代人生命中更为内在与根本的东西。而诗中所流露出的心灵的忧郁、悸动与不安,也同样传递着某种时代的信息,尽管暂时无论是发表这首诗的《红楼》编辑,还是它的读者,甚至连诗人本人都未必意识到这一点。但这首诗也就成了那个特定的多少有些微妙的历史时刻中国青年的心声。四世纪末,当一切尘埃落定以后,已经是权威的文学史家的谢冕,把这首刊载在《红楼》上的年轻大学生的诗选入他主编的《百年中国文学经典》(愿卷本,北京大学出版社,愿年版),作为那个时代的代表作,这正是一种历史的眼光。

人们还注意到,《红楼》愿年第 愿期的《编后记》,据说这是林昭写的:“我们希望在《红楼》上听到更加嘹亮的歌声。希望我们年轻的歌手,不仅歌唱爱情,歌唱祖国,歌唱我们时代的全部丰富多彩的生活,而且也希望我们的歌声像炽烈的火焰,烧毁一切旧社会的遗毒,以及一切不利于社会主义的东西。”这一期出版于愿年猿月,早在愿年文艺界已经出现了“干预生活”的文学浪潮,其代表作《在桥梁工地上》、《本报内部消息》等早已在影响最大的《人民文学》上发表,在孙玉石前述回忆中提到的引起大学生们极大兴趣的话剧《同甘共苦》也是这一思潮的产物。在前引《红楼》发刊词里就已经有了“干预生活”的说法,这里对文学的批判功能的进一步强调,则反映了像林昭这样的更具反抗性的年轻大学生的内在的怀疑精神与批判激情,他们对“旧社会的遗毒”(后来就被概括为“阳光下的黑暗”)的敏感,这或许正是另外一些尚沉浸在阳光下的幸福中的年轻诗人所不理解的,这里,实际上就已经预伏着此后《红楼》内部的分裂。但眼下却并不见裂痕:赞歌与情歌仍是《红楼》的主旋律。仅是发表于第 愿期的林昭的《姑娘说·调侃“奖章诗”的作者们》,多少显示点不同:如诗题所示,这是一首讽刺诗,调侃的对象是那些将“劳动”与“爱情”作简单联系的“新情诗”的作者:“亲爱的作者,你干吗非得要 在我胸前缀上各式各样的奖章? 那可恨的抒情诗啊,为什么总只能粘在奖章上? 看着你的诗,我不由得悲伤地想,知道吸引你的是我,还是奖章! 如世界上没有了奖章这东西,难道说你就无法把爱情歌唱?”这背后,其实是隐含着诗人对流行的对“诗歌(文学)”、“爱情”、“劳动(政治)”关系的庸俗化理解的质疑,一定程度上也是对时代主潮观念的质疑,并显示了一种逆向性的思维方式;同时,也启示我们:前文所说的《红楼》创作的“青春歌唱”的特征,是中国年轻一代处于“苏醒”时期的精神现象,不仅包含了巨大的自由“创造”冲动,也孕育着某种自由“批判”的激情。

而到了《红楼》第 猿期,就有了更为明确地呼唤。这一期的《编后记》里,这样写道:“我们愿意和北京大学全体师生一起,学习开辟了五四道路的革命先驱者的榜样,执著真理,疾恶如仇,把火一样的爱情献给祖国、人民、革命,把致命的投枪掷向阶级敌人,掷向思想领域的丑恶,……揭露现实中的矛盾,批判错误,歌颂先进。我

们希望把眼光放远一点,看得广些,关心国家政治经济生活,学术思想界的动态,文坛上的重要现象和问题。”——如果说《红楼》第 1 期编者与作者的目光主要是面对校园内部,现在则明显地转向更广阔的外部世界,以年轻人所特有的敏感,感受着此时国家政治、经济生活、思想、文化、学术界所孕育的新的变动,并表现了以“执著真理,疾恶如仇”的精神投身进去的巨大热情。于是,就有了这样的自我反省:“许多读者指出,在本刊第一、二期上软绵绵的情歌多了一些,看不到更加富于时代特征的雄壮的篇章”,并且提出了这样的质疑:“难道说今天的青年歌声中的主流,真是小夜曲?”表示要“从前人英勇顽强的斗争精神中吸取前进力量”;“大张双臂欢迎政治热情昂扬的诗篇”。而最后的召唤则更加意味深长:“作为五四事业的后继者,作为新时代的青年,‘鸣’起来!”

在这一期,为了纪念五四,就有了一次作为“更加富于时代特征的雄壮的篇章”的政治抒情诗的喷发。据张元勋回忆,这一次《红楼》编辑部几乎是全体动笔,由 11 位校园诗人集体高唱一曲《五四之歌》,“真可谓气势不凡”!“而这一组诗尚未排印之先就被北大诗歌朗诵团突击排练,成为一出动人的大型诗朗诵表演。于 5 月 4 日晚,在北大东操场五四营火会上与火炬传递同时隆重演出。……整个操场顷刻之间变成一个火炬的海洋、光明的海洋、炽热的海洋、呼啸的海洋!而诗朗诵便在高音麦克风里昂扬响起”^①。“在五月,我的心情更加明朗,就像我头顶上的天空一样。在火的三十一天里,我觉得自己长得更快,就像童话中的人物,不是一年一年地长,而是一天天地长!”“我向往震撼世界的五四运动,羡慕流血的一二九,但是,我更爱我们这个时代,——共青团驰骋的年代。十年后,或是一百年后,我们将坐在青青的草地上,二十一世纪的青年,我们共青团豪迈的故事,那时候,我,也许成了一个老共产党员,或者,在共产主义的天气里,党已经消亡。”啊,“五月,我的心情更加明朗,我真想和我的每一个同志亲吻,合唱我们最喜欢的歌子,傍晚一直到天亮!”(马嘶:《给我的共青团》,诗载《红楼》第 1 期)。——这更是一次浪漫的乌托邦的政治激情的喷发,用的是赞歌的形式。但谁也没有料到,另一种形态的政治激情的喷发,正悄悄地接近。

这时的《红楼》编辑部却弥漫着一种离情:编委会内与编委会外的一些作者都邻近毕业了。于是,就有了 5 月 4 日这一天的游园活动。十一位《红楼》文友漫步于颐和园,并由林昭摄影,留下了唯一的、也是最后一张合影,为这段青春岁月留下永恒的纪念。^②照片上,每一个人都在微笑。但谁知道,等待他们的将是真正的分离:政治的分离与心灵的分离呢?即使再度相遇,心也都破碎:历史对这一代人终

① 张元勋:《北大往事与林昭之死》,《没有情节的故事》,第 100 页,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8 年版。

② 同上书,第 100 页。

于露出了严酷的一面。

（二）贴在墙头上的诗：诗歌参加论战

就在 缘月 圆日 这天的晚上，北大出现了第一批大字报：先是历史系一群同学贴出大字报，责问团委会关于全国第三次团代会北大代表产生的情况，接着哲学系学生龙英华，数学系学生陈奉孝、张景中等，与历史系学生许亭南先后贴出大字报，或“要求开辟民主墙”，或主张“取消党委负责制”、“废除政治必修课”、“取消秘密档案制度”、“确保言论、集会、出版、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① 当晚，学校就骚动起来，校园的宁静被打破了。

第二天早晨，同学们到大餐厅（前述发行《红楼》第 1 期的地方）就餐，又发现东门左侧贴着一张大字报，是一首长诗，作者是《红楼》的作者沈泽宜和编委张元勋。由于这首诗影响重大，全文抄录于此——

是时候了

（一）

是时候了

年轻人

放开嗓子唱

把我们的痛苦和爱情

一齐都泻到纸上

不要背地里不平

背地里愤慨

背地里忧伤

心中的甜、酸、苦、辣

都抖出来

见一见天光

把批评和指责

急风般落到头上

新生的草木

从不怕太阳照耀

我的诗

^① 关于北大 缘月 圆日 贴大字报的情况，有各种不同的说法。这里，所根据的是 缘年 苑月 圆日、圆日召开的有一万一千人参加的北京大学“批判《广场》反动集团”大会的发言材料，见北京大学《浪淘沙》编辑部、北大校刊编《粉碎 广场 反动小集团》。

是一支火炬
烧毁一切
人世的藩篱
它的光无法遮拦
因为它的火种
来自——“五四”!!!

(二)

是时候了
向着我们的今天
我发言！
昨天 ,我还不
弹响沉重的琴弦
我只可用柔和的调子
歌唱和风与花瓣
今天 ,我要唱起心里的歌
作为一支巨鞭
鞭笞阳光中的一切黑暗！
为什么 ,有人说团体里没有温暖？
为什么 ,有无数墙壁隔在我们中间？
为什么 ,你和我不敢坦率地交谈？
为什么.....
我含着愤怒的泪
向我辈呼唤
歌唱真理的兄弟们
快将火炬举起
火葬阳光下的一切黑暗 !!!^①

这是典型的“墙头诗”，在抗日战争的烽火中出现过，在 1946 年代后期国民党统治区的学生民主运动中出现过，都发挥了极大的鼓动作用，曾点燃了无数热血青年的心，现在它第一次出现在共产党所领导下的新中国，自然不能不引起极大的注意与震动。这是一种被压抑的声音（“背地里的不平、愤慨、忧伤”）、急欲公开表达的

^① 《是时候了》一诗，现存资料中，字句略有不同，这里依据的是第 1 次作为“附录”公开发表的《红楼》第 1 源期。

诉求(“向着我的今天,我发言”),是以五四为源头的民主、自由的呼喊,并且旗帜鲜明而又尖锐地把批判的锋芒指向“阳光下的黑暗”;它所采取的又是马雅可夫斯基“楼梯式”的形式,形成鼓点般的节奏,一再重复“是时候了”的呼唤,更取得了震撼的效果:它是极能唤起年轻人的内在的批判激情的。如前文所分析,它已经郁积已久了。

因此,《是时候了》一诗一出,即如一石激起千层浪,在整个校园引起了爆炸式的反响。

很快就在《是时候了》的旁边,出现了另一张大字报,题目是《我们的歌》,这是中文系新闻专业一年级的学生写的,领衔者江枫也是《红楼》的作者。诗一开始就明确表示:“我们不同意《是时候了》的基调,那声音仿佛是白毛女申冤”,“为什么那声疾呼着‘急雨’,为什么不能用柔和的调子”?真理的力量不在于“真理的揭示者”姿态的“疯狂”,“假使我们爱党,首先想到的会是‘果实’,而不是‘心于斯底里式的’一段”;“我们也难于接受你们举起的‘火炬’,尽管你们自己宣称‘它的火种来自五四’”。诗人毫不掩盖自己的维护现存秩序的立场,宣称“我们的曲调之间不太和谐,也难怪。我们缺乏你们那根沉重的琴弦”,“我们并不像你们经常‘在背地里不平愤慨’”。要放火吗?我们也不打算”。^①

声音也依然真诚而坦率,那个时代人们还没有学会掩饰与做戏。于是,就形成了两军对垒,旗帜鲜明:依照人们在现存体制中所处的不同地位,采取了完全针锋相对的立场,并展开了短兵相接的交锋,而且依然采取诗的形式。

针对《我们的歌》“那声音仿佛是白毛女申冤”的指责,物理系四年级学生刘奇弟就公开打出《白毛女申冤》的旗号:他要控诉肃反运动中对无辜学生的无端迫害:“啊,天知道,白毛女反党,反人民,反革命”,“今天,白毛女要问:逮捕证在哪里?为什么设公堂,私人审讯?为什么伤害人身心?无法做什么用?这是谁出的主意?”他也写了一首《是时候了》:“为何不是时候?难道谁还苦闷得不够?为何不是时候?我们的嘴还要封多久?为何不是时候?你还想千万人头落地?(斯大林杀的忠诚党员)为何不是时候?我们还要等匈牙利事件再起?(拉科西种的根)”

刘奇弟的呼喊引起了许多肃反运动的受害者的共鸣,一位叫邓贵介的学生写了一首《孤独者的歌》,他所倾诉的,不仅是被“随随便便逮捕,随随便便定罪,随随便便释放”的折磨与痛苦,更是即使平反以后也依然被孤立、被隔绝的精神痛苦:“今年,我再碰不到审问员,也没有被押到很多人面前,遇到很多人,他们与我点点头,瞪眼,不理睬……一个人接着一个人,一个领导接着一个领导,我

^① 《我们的歌》,收《红楼》第 1 期。

面前过去过去多难受啊——他们还有什么理由让我孤独？”他始终弄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要赶走这颗赶不走的共产主义赤心？”^①

林昭看了《我们的歌》，愤慨难忍，深夜写了一首《这是什么歌》，坦诚直言：“我（并且不止我一个）指责这种凌人的盛气”，“为什么非得搬出非得死人的名词，疯狂歇斯里……，几乎就差一句反革命分子”；“如果我们爱同志，首先想到的会是亲切的帮助，而不醉心于指手划脚的满脸义愤的、有介事的、鸣得意”。她尖锐地指出，分歧正是由于对现实有不同的感受，这又是根源于不同的生存境遇、利益关系：“是啊，也许不曾有过那样的日子——背负着沉重的歧视、冷淡和怀疑，在凝定的孤寂里，黯然徘徊，不知道哪儿有沉的水，不眠的长夜，口口，自吞着苦泪，也许你一直在青云里，么不平、愤慨，忧伤和你全无关系，因为你缺乏那根沉重的琴弦，怪不得你。”诗的最后，她把批判的锋芒直指“真理”的垄断者与“代表”：“真理的力量不在于维护真理者姿态的傲慢。因为你即使你当仁不让，我其谁）竟不能代表真理。”^②——林昭所要维护的正是每一个公民都应拥有的探索真理的权利。此后，林昭还写有《党，我呼唤……》，用“任锋”的笔名发表，据说被收入《北大民主墙选辑》（《广场》），但已失传，仅在批判文章中得其残句：“奇怪的谴责像马刀砍来，载年青的心伤痕斑斑”，“日夜在痛苦中徘徊”。^③

林昭的《这是什么歌》发表以后，《我们的歌》的作者即发表声明，宣布“休战”，这场诗的论战似乎暂告段落，但《是时候了》掀起的心灵的风暴并未停息。于是，又有俄语系的诗人杜嘉真写了同题诗，以示呼应与补充：“‘是时候了！’——这是响亮的呼声，骤然，它的人，着怨愤；这是这声音里，着战斗；这声音，能使血液沸腾”，“每个人，皱着眉头，思索，看吧，群众的海洋，波浪到了底层，我们要再一次，清洗自己的生活”。——这里所提出的“波浪最底层”，“再一次刷新自己的生活”的命题或许是更为深刻与根本的，但却被更加急切的政治性的话题所淹没，似乎没有引起什么反应。

不久，林昭又引起了另一场争论。在缘月圆的辩论会上，林昭以她固有的坦诚谈到自己内心的矛盾：“我感到组织性和良心有矛盾。”此时北大部分“文艺界人士”（其中有《红楼》的编委、作者张炯、谢冕、任彦芳、江枫、曹念明、王磊、杜文堂

① 刘奇弟、邓贵介的诗都因收入《右派言论汇集》而保存下来，此书现存北京大学图书馆。

② 林昭此诗当时影响很大，但久寻而不得。正以为已经失传，突接老同学韩乐群君来信，从他当年的日记中抄录了此诗，大喜过望。韩君又将其保存的《红楼》、《浪淘沙》杂志相赠，并写有题词：“乐群珍藏，随我四十余年。赠理群吾弟保存，定可发挥更大作用，寄厚望焉。”或许正是这“厚望”的压力促使了本文与本书的写作。文章写出，可以告慰老友与林昭在天之灵了。

③ 参看王南山、杜北原：《分行的诅咒，有韵的诬蔑——评北大民主墙选辑（《广场》）的反动诗歌》，载《红楼》“反右派斗争特刊”源号。

等三十余人)已经开辟了“卫道者论坛”,在宣言书中有这样的说法:“有人说我们毕竟不代表真理,我们愿意和所有一切愿意追求真理的同志把真理追求”,“有人说要像狼一样吃掉卫道者。那么吃吧,如果办得到!”^①前者显然是对林昭《这是什么歌》的回应(“卫道者论坛”参加者江枫、曹念明都是《我们的歌》的主要作者),而后者更是针对张元勋的。在林昭作了前述发言后,“卫道者论坛”即发表了一首题为《致林昭同志》的诗。作者接连发出责问:“青年团的组织性就是良心,团章哪一条要我们为组织性昧去良心?”“该怎样理解你的良心和你的真理?”作者并且声称自己“并不感到(组织性与良心的)矛盾”,这正是近于《我们的歌》的立场。“卫道者论坛”的开辟与这首诗的发表,显然意味着《红楼》编辑部与作者群思想上的分裂,并且已经公开化。林昭本人对这首诗未作回应,倒是另一位校园诗人杜嘉真写了一首《组织性和良心——致林昭》的诗,对林昭表示了深切的理解:“你吐露出了深心的怀疑,我知道你为什么说出了这句话,这句话有多少酸辛。我更知道你的心比他们怀着更多的真理,更多的同情”,并这样尖锐地批评那些“卫道者”们:“他们‘快乐地成长,并不觉得矛盾’,生活和文章都是那样四平八稳!他们从没看见组织上的错误,看见了也从不承认;他们从没看见别人的痛苦,更从不感到自己应负的责任。我痛心,他们为什么这样的麻木不仁;我痛心,他们为什么‘为组织性昧去了良心’。”诗人更是无情地揭示了自己的也是林昭的内心痛苦,把批判的触角伸向自我灵魂的深处:“同志啊,我知道你那欲言而又不取的苦衷,多少人和你一样怀着这种复杂的心情”,“扪心自问,在过去,我们曾多少次说出了违心的话,做了它(组织)驯服的奴隶。多少次压抑了自己,伤害了别人,如今事过境迁已悔之莫及;你的事使我们如此羞惭、痛苦,你的事将使我们遗恨终身”。——这样的对自我奴性的正视与清醒也许是更为重要的,这才构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反叛。诗人因此而向世人,也向自己,发出这样的警示:“别让那‘组织性’掩盖了你的盲目,虚伪和不正,别让它隐藏了对权力的畏惧,和那些自私自利的目的。即使在执行组织的决议时,也要保持你说话的权利。”——这里,几乎是一针见血地点破了现代中国的时代病症,新的国民劣根性与知识分子的痼疾,但正因为它过于尖锐,为当时的大多数人(包括知识分子)所不能接受,诗人因此而罹难,整个民族也为拒绝忠告而付出了代价,这些疾病至今还在缠绕着我们。可以看出,《是时候了》与《我们的歌》的诗论战,发展到这里,已经是相当深入了。

杜嘉真还写了一首《致勇士》,对《是时候了》里所发出的“鞭笞阳光下的黑暗”的号召,作了更深入的思考,提出了一个“黑暗里做一个勇士——容易;光明里做一个勇士——难”的命题。诗人这样写道:“在光明里的你鞭笞上了各式各样的鞭衫;你的握着鞭的权杖窒息着奴性;有的高举着霸道主义的大旗鞭

^① 参看张炯、谢冕:《遥寄东海》,载《红楼》第源期。

党、鞭人民。勇士啊，信心要百倍坚定。勇士啊，眼睛要格外分明。既不能把光明看成黑暗，也不能把黑暗当作光明。”——这又是一个非常重要也非常及时的提醒。现实生活中经常出现“看似光明，实为黑暗”与“看似黑暗，实为光明”的混杂现象，如何识别“真假（光明与黑暗）”，这正是时代向真正的“勇士”提出的一个新的课题。在诗的结尾，诗人对这些新时代的“勇士”的命运作了这样的预言——

我相信
黑暗
会永远存在，
像大地上
永远
会有尘埃。
我相信
勇士
会在斗争中
倒下，
但勇士的精神
将像松柏般
常青。
我相信
勇士
会被历史
湮没，
但勇士会用
生命
鞭笞着社会
前进。^①

或许这正是对 1957 年燕园发生的这场由《是时候了》引发的用诗的形式展开的思想交锋的最好总结。《是时候了》与《致勇士》这两首政治抒情诗，也许因此而获得了某种史的意义和价值。

^① 杜嘉真的这几首诗《是时候了》、《组织性和良心——致林昭》、《致勇士》均收《右派言论汇编》。